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八九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集

1989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9 年

从评价《群言》说起	(2)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5)
《关于男人》再版序	(8)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后	(9)
关于男人（之八）	
十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12)
致王一地（1月27日）	(15)
《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16)
纪念老舍九十诞辰	(17)
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	(19)
在巴黎的一百天	(21)
致巴金（2月11日）	(23)
话说散文	(24)
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民进妇女》	(27)
七十年前的“五四”	(28)

真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30)
我喜爱小动物	(33)
致宫玺 (3月9日)	(37)
记老友沙汀	(38)
《心笛诗集》序	(41)
《月季花》序	(44)
谢家墙上的对联	(45)
我喜欢下雪的天	(48)
致赵朴初 陈邦织 (4月7日)	(50)
为全国少年儿童有奖命题征文大赛题词	(52)
祝贺《民主》月刊创刊	(53)
痛悼胡耀邦同志	(55)
致萧乾 (5月5日)	(57)
致萧乾 文洁若 (5月11日)	(59)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四十周年题词 ...	(61)
又走了一位不该走的人	(62)
一饭难忘	(64)
致宫玺 (6月20日)	(67)
致宫玺 (7月4日)	(68)
致颜学琴 (7月12日)	(70)
致陈荒煤 (7月14日)	(71)

钱钟书与杨绛	(72)
致王安忆 (7月24日)	(74)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75)
开卷有益	(77)
忆读书	(83)
致巴金 (9月9日)	(87)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88)
我家的茶事	(91)
给《农村孩子报》的回信 (10月22日)	(94)
叶圣老——一位永垂不朽的教育家	(95)
喜读《民主》第一、二两期	(97)
儿童是最真诚的	(101)
关于男人 (之九)	
十一 怀念郭小川	(105)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109)
再谈我家的对联	(111)
谈孟子和民主	(114)
毛泽东诗词鉴赏一得	(117)
介绍《铁血情缘》	(125)
我的写作经验	
——为《中国初中生报》题	(128)

1989 年

从评价《群言》说起

我认为在我书桌上的几十种刊物杂志中，能使我不能释手地从头一篇一直看到末一篇的，只有《群言》！

从前看过的几期不说了，只谈最近的 1988 年的第 12 期，就有几篇极好的文章。

头一篇就是卷首丁石孙同志的《问题在于把教育放在什么位置》。

在我自己的经验是作为一个当家的人，一个主妇，从有限的收入中，在盘算支出的时候，总是先留下一笔最重要的买米、面粉、玉米面等等做饭、蒸馒头、做窝窝头的原料，因为“民以食为天”，而在饭食中，这些东西又是必不可少的。至于饼干、糖果、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于含维他命 C 最多，最有营养的水果，如桔柑之类，也都是在米、面等都具有了之后，“行有余力”，才开始考虑购买的。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中央说过无数次的煌煌宣

言，我这个小小老百姓，不必再重复了。我只记得古人说过“为政不在多言”，我希望做国家的当家人，真格地把教育经费也像每一家的主妇一样，当做买米买面的钱一样，在筹划“家用”的时候，先把它存到一边，那么至少在十亿人民之中，不至有两亿多的文盲了！

在这一期《群言》“十年以来”栏内，还有陆诒同志的《要有点危机感》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觉得这文章的题目还“出”得太温和了！我们不是要有“点”危机感，而是应该有“迫在眉睫”、“压在心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请抬头看一看全国青少年中普遍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以及“全民经商”的怪现象，——我手里本来还有的，去年福建宁德县有几百位中小学教师弃教从商的事情（忘了是在哪家报纸上的）以及去年12月29日的《北京日报》第四版上的“辽宁省有一个学年初中生辍学11万人”的报道，我认为这几百位教师和11万个中学生，不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怨愤理由！

我的确老了！眼睛里又生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我不能“引用”“抄写”我所讲的《群言》1988年第12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许多警句，我请求每一个中国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我们

是应该都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民们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 21 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

1989 年 1 月 5 日晨（戊辰小寒）

（本篇发表于《群言》1989 年第 3 期）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我看着我客厅里的两架玻璃书柜里堆叠着的许许多多海内外的朋友亲戚和许许多多不认识的小朋友送我的贺年片。那些片上的图画真是花团锦簇，不但有花朵、儿童，还有更多的小猫（也都是白色的，和我的咪咪一样）。

我衷心地感谢这许多年来给我写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们，他（她）们的情意是那么恳切，字迹是那么工整，最后还总是祝我健康长寿。我的寿命真是不短，算来已经度过八十八个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却有不少问题，我从一九八〇年九月右腿骨折后，不但行动不自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这时亏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陈珣同志，日夜在帮助照顾我。我不但夜里不能自己翻身，连人家把我扶坐书桌前以后凡是我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还是要人帮忙，比如拿一本

书，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烦人的。我们一般笑骂无用的人是“行尸走肉”，但是我却连“行尸走肉”都不如，因为“尸”“肉”还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以前，我也还是走遍五湖四海。我半夜醒来还会悄悄地呜咽！

我勉励着自己坚强起来，还满有希望似地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但实际上那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我近来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节增生，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起来、坐下、看书、写字都有困难……总之，这些都是我从来不复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了精力。但我已珍重地将这些年来收到的千百封可贵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他们代为收藏起来了。

中国俗话说：“岁数不饶人”，老年来到了，这原是无法抗拒的千古以来的真理。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确地承认这个真理！

话说回来，我看着我玻璃书柜里堆积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贺年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也记得西方一本圣书上有句能够说出我心底的话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1989 年 1 月 7 日大雪之后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3 期）

《关于男人》再版序

《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写了，因为我已活到八十八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1989 年 1 月 9 日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后

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亲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诲的荣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是我们一般大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号人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这些歌颂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蔡先生重视教育，尤其是美育，他还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对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师兼收并蓄，使学生们对各种学术流派都有研究学习的机会。我最记得那时学术界所斥为最顽固的，直到民国成立几十年后，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先生，也因为他久游西欧，学识渊博，而被蔡先生延聘为北大教授。辜先生还有他自己的条件，就是上课的时候，全班学生必须先进课堂，而后他才进去；下课的时候，也必须他先出来，然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蔡先生爱才若渴，可见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

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

的文化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荣幸！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政协报》1989年2月21日。）

关于男人（之八）

十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〇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

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

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

1989 年 1 月 26 日阳光满案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9 年第 3 期。）

致 王 一 地

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

祝你
合家安吉

冰 心

一，廿七，一九八九

^① 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1988年6月号。冰心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

《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关于女人》。但是那本书实在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 心

1989 年 1 月 30 日于北京

纪念老舍九十诞辰

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 friend。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

（此文是冰心为纪念老舍九十诞辰而写给幽州书院的，发表于《北京晚报》1989年2月13日。）

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

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

一九八九二月三日

（本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1989年2月20日。）

在巴黎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女人》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

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1989年2月4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三月风》1989年第6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听吴泰昌电话中说，你又摔了一交，伤了腰，又进医院。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以后也不要不服老，身边一定要有人才行。像我一样（我走路靠“助步器”）一举一动都有人扶持。

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将你写在《关于男人》之中了（将载《中国作家》）！我从前写的都是已故的人，现在我想我已 88 岁，也是“行将就火”，若不趁我还有口气，不把几个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等死了就来不及了。不过写了你以后，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

冰 心

二、十一、一九八九

话 说 散 文

“关于散文”的文章我写得多了！1959年在《文汇报》上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散文》，收在《冰心文集》第四卷193页。大意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又说：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又说散文的范围最广：如古文中的《祭十二郎文》、《阿房宫赋》、《陈情表》、《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无论是“文”，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言”，都可以归于散文一类。

我还说：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等等。

我还夸说：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

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华光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我说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感情，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乃是代表他自己情感的独特的语言……等等，等等。

我这一辈子写了有一二百篇散文，多半都是千字文，现在拿起自己的文集来看，觉得大多数都是“做”的！连那篇《关于散文》也是“做”的，说的都是些空泛的夸赞的话，写过自己也忘了！

但是其中有一篇，使我不敢轻易翻看，一看就会使我惊心，使我呜咽，而且它是我写过的散文中最长的一篇，大约一万五千字左右吧，这篇就是收在《冰心文集》第三卷里的“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南归》！

我写《南归》的时候，只感到我是在描绘从我眼前掠过的，十分真切的人、物、情、景的一幅幅画面。我手里握着的不是笔，是兵士手里的枪，是舟子手中的桨，是伐木者手中的斧子。而从那支枪里发出的一万多颗火热的子弹，从那支桨下划起一万多朵冰冷的浪花，从那斧子砍下的一万多根尖利的树枝，都朝着我的“心”射来、溅来、刺来……使得我这一篇最长的散文，成了我不敢重读的从我血淋淋的心中流

出来的充满了血泪的文字！

1989 年 2 月 18 晨

（本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89 年第 5 期。）

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民进妇女》

三八国际妇女节，本来是 1909 年 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女士为争取自由平等举行盛大的罢工示威游行的日子。自此以后，“三·八”已成为国际妇女节。

对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来说，本会会员多是教育、出版界人士，其中的中、小学教师又以妇女居多。我认为我们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应该加强扩大为妇女发表言论、意见的园地——《民进妇女》，而《民进妇女》还是我国各民主党派中仅有的一份妇女刊物！

1989 年 2 月 20 日

七十年前的“五四”

七十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画面在我的心版上却十分真切。

“五四”那天，我还陪着刚动过耳后手术的二弟为杰，住在德国医院。第二天我的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车美地就匆匆忙忙地跑来了，说，“小谢，你快回去吧！昨天北京的学生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众游行，在街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过几天就要审问，你这个‘学生会’的文书，是要去旁听写报告的，快回去吧！”她说得又兴奋又激昂，第二天就带着病后的二弟回家，又回到学校去了。

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防堤冲破了，我们也罢了课，参加游行，参加宣传，

还三三两两地抱着“扑满”，在大风中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行人，请求大家捐几个铜子儿，帮助我们慰问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旁听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还写了一篇《听审记》送到《晨报》发表，从此我便开始用白话文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又写开了小说，都是描写当时社会问题的。

因为写作，我耽误了许多理科的实习功课，如解剖学之类。我本来想学医，入的是协和女大的理预科，现在只好弃理从文，这是否“误入歧途”呢？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1989 年 2 月 23 日

（本篇原载《散文世界》1989 年 5 月号）

真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看了一月二十三日的《参考消息》上有“突尼斯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 25%”的消息。他们的教育部长说：“教育改革内容主要是教育民主化，使每个 6 至 15 岁的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这种制度，扫除文盲。突尼斯的文盲率至今仍达 46% 左右……这是一项宏伟的教育战略，其目标在于提高儿童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掌握一般的文化和受到平衡的培训。”

突尼斯是一个非洲国家，面积不过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七百七十一万，他们的教育部长能够这样地关心文盲问题，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国，十一亿人口中有两亿多的文盲，我们怎么办呢？

在二月十九日的《北京日报》上，我看了上面的“发展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极为主要的任务”的标题下，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的一段在国家教委工作会

议上的谈话后，我的眉头展开了！我所知道的教育情况，教委领导知道的比我更多，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段新闻很长，又很重要，我郑重地建议关心教育的读者，重新找出那一天的报纸仔细看看！

李铁映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全国有两亿多文盲，国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 5 年。教育这等的落后状况，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严重制约着我们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现在不作出很大的努力，把教育搞上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丧失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着重点是抄者加的！）

最后他说：“努力做好 1989 年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要，我们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使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着重点是抄者加的！）并迈出坚实的一步。”

我近来眼睛患有白内障，看书报写字都有困难，刚才抄了半天报纸，不但眼睛模糊，我的手也酸了。但是，在书案上的灿烂阳光中和案头一瓶红、紫、黄、白鲜艳芬芳的花朵，使我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喜悦，因为国家教委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而且，说得更完善而

有力！

1989 年 2 月 24 日晨

（本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5 期）

我喜爱小动物

我喜爱小动物。这个传统是从谢家来的，我的父亲就非常地喜爱马和狗，马当然不能算只小动物了，自从 1913 年我们迁居北京以后，住在一所三合院里，马是养不起的了，可是我们家里不断地养着各种的小狗——我的大弟弟为涵在他刚会写作的年龄，大约是 12 岁吧，就写了一本《家犬列传》，记下了我家历年来养过的几只小狗。狗是一种最有人情味的小动物，和主人亲密无间，忠诚不二，这都不必说了，而且每只狗的性格、能耐、嗜好也都不相同。比如“小黄”，就是只“爱管闲事”的小狗，它专爱抓老鼠，夜里就蹲在屋角，伺伺老鼠的出动。而“哈奇”却喜欢泅水。每逢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一定在船后泅水跟着。当弟弟们划完船从北海骑车回家，它总是浑身精湿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我们胡同里倚门看街的老太太们喊：“学生！别让你的狗跑啦，看它跑得这一身大汗。”我的弟弟们都笑了。

我家还有一只很娇小又不大活动的“北京狗”，那是一位旗人老太太珍重地送给我母亲的。这个“小花”有着黑白相间的长毛，脸上的长毛连眼睛都盖住了。母亲使用红头绳给它梳一根“朝天杵”式的辫子，十分娇憨可爱，它是唯一的被母亲许可走近她身边的小狗，因为母亲太爱干净了。当1927年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父亲买了两张半价车票把“哈奇”和“小花”都带到上海，可是到达的第二天，“小花”就不见了，一般“北京狗”十分金贵，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我们一家人，尤其是母亲，难过了许多日子！

谢家从来没养过猫。人家都说“狗投穷，猫投富”。因为猫会上树、上房，看见哪家有好吃的便向哪家跑。狗就不是这样！我永远也忘不了，40年代我们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时，我的小女儿吴青从山路上抱回一只没人要的小黄狗，那时我们人都吃不好，别说喂狗了。抗战胜利后我们离开重庆时，就将这只小黄狗送给山上在金城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后来听我的朋友说，它就是不肯吃食——金城银行的宿舍里有许多人养狗，他们的狗食，当然比我们家的丰富得多，然而那只小黄狗竟然绝粒而死在“潜庐”的廊上！写到此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1947年后，我们到了日本，我的在美国同学的日

本朋友，有一位送了一只白狗，有一位送了一只黑猫，给我们的孩子们。这两只良种的狗和猫，不但十分活泼，而且互相友好，一同睡在一只大篮子里，猫若是出去了很晚不回来，狗也不肯睡觉。1951 年我们回国来，便把这两只小动物送给了儿女们的小朋友。

现在我们住的是学院里的楼房，北京又不许养狗。我们有养猫的经验，知道了猫和主人也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小吴青十分兴奋地从我们的朋友宋蜀华家里抱了 3 只新生的小白猫让我挑，我挑了“咪咪”，因为它有一只黑尾巴，身上有 3 处黑点，我说：“这猫是有名堂的，叫‘鞭打绣球’。就要它吧。”关于这段故事，我曾在小说《明子和咪子》中描写过了。咪咪不算是我养的，因为我不能亲自喂它，也不能替它洗澡，——它的毛很长又厚，洗澡完了要用大毛巾擦，还得用吹风机吹。吴青夫妇每天给它买小鱼和着米饭喂它，但是它除了 3 顿好饭之外，每天在我早、午休之后还要到我的书桌上来吃“点心”，那是广州精制的鱼片。只要我一起床，就看见它从我的窗台上跳下来，绕着我在地面上打滚，直到我把一包鱼片撕碎喂完，它才乖乖地顺我的手势指向，跳到我的床上蜷卧下来，一直能睡到午间。

近来吴青的儿子陈钢，又从罗慎仪——我们的好友罗莘田的女儿——家里抱来一只纯白的蓝眼的

波斯猫，因为它有个“奔儿头”，我们就叫它“奔儿奔儿”。它比“咪咪”小得多而且十分淘气，常常跳到蜷卧在我床上的咪咪身上，去逗它，咬它！咪咪是老实的，实在被咬急了，才弓起身来回咬一口，这一口当然也不轻！

我讨厌“奔儿奔儿”，因为它欺负咪咪，我从来不给它鱼片吃。吴青他们都笑说偏心！

1989年3月9日晨

（本文最初发表于《新观察》1989年第7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来信收到，您对《文集》那样小心的看，我真是太感谢了，尤其是在您心思烦乱之际，您说“十分吃力”，求您别太用力了，还是多看护病人为好。

您说您爱人的病已到最后阶段，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已有了经验，千句并一句说，古人说过，“死生有命”，陶渊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总之，请您想开一点，好好地让她度过最后的日子，您有儿女吗？他们都在那里？可以分劳吗？我很好，就是忙，请您保重！

冰 心

三、九、一九八九

记老友沙汀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在认识天翼的同时认得沙汀的。那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里，天翼住的是东屋，沙汀住的是西屋。他是个爽朗的人，一见如故，大说大笑，四川口音很重。这使我想到了巴金。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住的时候，巴金每到重庆，必上山来看我。并且取走了我的《关于女人》那本书，到上海开明书店去发表。其实那时沙汀也在重庆，并且和巴金、靳以、老舍等人也都认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接触过呢？

前话不说了！且说五十年代我们相认了之后，就来往频繁了，我们常在作协开会时见面，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至少是在1961年到日本去的那个以巴金为首的访问团里。在那许多年里，他送给我一大包他的著作，如《沙汀文集》三卷，《沙汀选集》两卷，以及《睢水十年》等等。这些小说和散文都极大地扩大

了我对于中国旧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因为在我青少年的知识里，很缺少这些东西。

沙汀的文笔极其犀利而又尖刻，细腻而又质朴，展示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揭露了西北农村的地主、豪绅、乡保长、地痞的鱼肉群众的罪恶，而且他们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丑恶面目。他的小说每一篇都代表着他的创作内容和艺术特点，他以冷静、沉着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的丑恶画面。

还有他对贺龙将军和彭德怀元帅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也增加了我对这两位伟大的军人的崇敬。

回来再说我们的私交。沙汀是我们家里甚受欢迎的一位客人。我们的在四川生长的孩子们因为沙伯伯的一口四川话，就亲热地拉着他，用他们所熟悉而且留恋的四川语言，说个不停。最突出的还是在我的文艺界朋友中，沙汀是最受文藻欢迎的一位，理由是沙汀酒量很大，能和文藻一起喝茅台！文藻喝酒的习惯，是从小陪父亲喝闷酒养成的，但那是绍兴酒而不是茅台。文藻和我结婚后，我就劝他戒酒，有时请客吃饭，席上也只准备红葡萄酒。但是每逢沙汀来了，文藻就一定要留他吃饭，而且让我把人家送的由我藏起的茅台酒拿出来，和沙汀边喝酒边谈笑，两人似乎都很开心！

沙汀在北京和成都有个家。他到北京的时候，也有时来看我，来时总有一位年轻的人陪着，这位青年人是专门照顾他的。我自 80 年代初伤脚以后已有八年是不出户了，当然也不能去回访他，而且他来时也往往只坐谈一会儿就走，说是怕我累着。显然我们彼此都老了，虽然他还比我少几岁！我厨柜里还有一瓶茅台，但是文藻已于三年前的九月逝世了，我再也没有留沙汀吃过饭，因为我不喝酒，更不敢吃烈性的茅台，有肴无酒，不但索然无味，也会引起彼此的伤心！

1989 年 3 月 12 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安县报》1989 年 5 月 25 日。）

《心 笛 诗 集》序

心笛是侨居美国的中国女诗人。

她原籍江苏常熟，1930 年左右生于北京，在南京和台湾上过中学，1950 年赴美，大学以后的时期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心笛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诗人，她身居异邦，心怀祖国，她用祖国的文字，像潺潺的流水般自由畅快地写出她心里的生活中的忙迫和因怀乡和寂寞而引起的淡淡的哀愁。

对她的诗的理解，还是要读者自己仔细地去读她的诗。

我自己喜欢她的没有标点符号，有时分段，而多半是不分段的自由写法。

她离开祖国后曾回来两次，一次是作为访问团中之一员，来游览了祖国的山河，她在《长城》这首诗中，就有自己的见解，她没有他人对长城所共有的自豪感，而是说：

比长城还长的悲惨故事
是多年来老百姓的日子

她的《移植》中的末一节说：

啊中国的幽兰
只放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
祖传的傲骨和气质
使你永感移植的苦凄

和她的那首《蒲公英》中的几句：

你的相思
萦绕地球东西两方
日夜思念着祖先的村庄
.....
洋房草地边被人歧视
自由的天空下也感彷徨

不就说尽了她去国怀乡的遭遇吗？

至于她的那几首《厨景》，《厨锅》，《厨房歌》大概
是国外当主妇的共同的负担和悲哀吧。

心笛是我们的朋友浦湊生先生的女儿，我初次

见她时，是在抗战胜利后，她父亲的南京家里，那时她还是一个聪明俊俏的小姑娘。1983 年她随美国的访问团回来，我们曾见过几面，这时她已是个成熟的小妇人了。1984 年她又回国，是专门到我们家里做客的，我们朝夕相处了三个星期，我真是喜欢她，她心里充满了爱，她真挚深沉地爱她的祖国，她的同胞，和她周围一切的人和物。我在 1984 年 9 月 14 日写了一篇小说《桥》，就是讲的这段相处的生活，只是人际关系和人名都改了。《桥》是我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冰心著译选集》中册里的最后一篇小说，为了更好地了解心笛，读者不妨去翻翻看看。

1989 年 3 月 24 日急就

（心笛诗集《摺梦》，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月季花》序

百花之中我最喜爱的是月季花。

她有艳色浓香，也有一根坚挺的刺。是一种既有风采又有风骨的花朵。

我的小朋友杨伯荔，陈于化夫妇和我的学生蒋恩钿的儿子陈棣都是业余养殖月季花的能手。他们合著的这本《月季花》既有研究的资料和实践的心得，还有关月季花的种种美丽的图片，真是声容并茂，可供海内外读者的学习和观赏。我亟盼它早日面世！

1989年3月30日

谢家墙上的对联

我从前写过我的识字是从父亲书房里的一副对联学起的。那是我幼年在山东烟台居住时的事，那副对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七索九丘

还有一副是清末以弹劾庆亲王而被谪南归的江春霖御史写的。那时他真是“直声震天下”！江老先生南下路过烟台时，在父亲的客室里住过几天。他写赠我父亲的一副对联是：

庠舍争归胡教授
楼船犹见汉将军

这当然是扣住父亲是海军学校校长的职位写

的。我那时不懂得细问“胡教授”是出自什么典故，只记得他在上款中还有几句“……被谪南下，阻雪难行。”他久知我父亲是个“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心向往之”，因此就在烟台逗留了几天。江老先生的字方正秀劲，真是“字如其人”！

1911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在老家，我们这一房是和祖父一起吃饭的。饭厅在堂屋的后厅，墙上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有祖父写的一副对联是：

谁道五丝能续命
每逢佳节倍思亲

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端午节那一天逝世的。

但是五月五日，是我们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四房的孩子们，各自从自己的外婆家照例得到绣得极其精美的红兜肚，上面还挂着由五色丝线缠成的粽子样子和五彩缤纷的香包。这一天我们额上点着雄黄酒，笑语喧哗地互相炫耀着自己得到的礼物。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却不敢露出半点笑容，因为祖父和我的父母都极严肃而沉默地低头吃饭。爱吃甜食的祖父，就连用糯米做的粽子也不吃了。

祖父平时十分慈蔼，饭桌上，我们总是笑语不断。祖父还爱吃甜食，逢年过节，我们总有应时的元宵节的“元宵”和端午节的粽子等等。母亲认为“元宵”是糯米粉包的，糯米太粘了，老人吃了容易生痰，因此每逢吃元宵时，母亲总会用眼神告诉我，去祖父碗里乞讨几颗“元宵”，祖父总是笑着让我吃几颗他碗里的“元宵”。

此外，我最记得的是北京中剪子巷父亲客厅里一副萨镇冰老伯的对联是：

穷达尽为身外事
升沉不改故人情

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充满着这位老人的风度和风骨。

可惜的是祖父和父亲逝世时，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否则我一定将这几副对联保留下来！

1989 年 3 月 30 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6 期。）

我喜欢下雪的天

雨天往往使我觉得沉闷抑郁，因为我喜欢阳光，但我喜欢下雪，因为雪也有耀眼雪光！

北京是比往年暖多了，暖得冬天很少下雪！今冬只在1月5日，“小寒”的那一天，下了一天的雪。我倚窗外望，周围的楼顶上都是白灿灿的一层，校园小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天上的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多么明亮，多么美丽！这一天我分外地喜悦。记得小时候住在山东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的大雪。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我和堂兄表兄们打雪仗，堆雪人。那雪人的眼睛是用煤球“镶”的，雪人的嘴是捅进了一颗小“福桔”，十分生动夺目。这时还听到我二弟的奶妈说“金钩寨里有一家娶亲的停在门洞里接新娘的红轿子，竟然半天抬不出来”。我多么想念我童年时代的大雪呵！

我竭力思索古人咏雪的诗句，而浮上心头的却是两首打油诗！

天公丧母地丁忧
万里河山尽白头
明日太阳来吊孝
家家檐上泪珠流

还有一首是：

天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我觉得第二首是完全写实的，“井上黑窟窿”一句尤为形象化，亏他怎么想得出来！

1989 年 3 月 31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6 期。）

致赵朴初 陈邦织^①

朴初老弟、邦织妹妹联鉴：

我曾给邦织打过电话，为的是星云大师来华的事，据舒乙（老舍先生的儿子，和我家非常之熟，他又是巴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知道星云大师来华，将由中国佛教会接待，朴初一定会和他见面的，听说星云大师定三月卅一日要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会有些捐助，这对经济拮据的文学馆，是大有帮助的。舒乙想请朴初写四个字，算是文学馆送他的，只四个字，想朴初不会惜墨如金吧，一笑。

我还好，只是回不完的文债和信，我母亲常说“事情是和生命一样长的！”我相信您们也会体会到这一点，舒乙在一旁等着，别的不说了，望您们保重！

① 陈邦织，赵朴初夫人。

冰 心

四，七，一九八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为全国少年儿童有奖命题 征文大赛题词

我十分赞赏《红领巾报》的“全国少年儿童有奖命题征文大赛”！他们的题目出得好！题目是要市长、老师和父母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同孩子们平起平坐地说知心话。这对于培养孩子们参政议政意识，和增进他们和老师家长间的感情，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敬祝大赛成功！

冰 心

四，十三，一九八九。

（题词最初发表于《红领巾报》1989年6月26日。）

祝贺《民主》月刊创刊

中国民主促进会决定创办《民主》月刊。主编同志写信给我说：“作为民主党派办的杂志，主要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各项改革，建设精神文明，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使民进也有参政议政、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渠道和为知识分子广开言路的园地……。我们刊物取名《民主》是继承解放前民进马老、郑振铎、徐伯昕同志那时办《民主》的传统……。”

这消息使我兴奋而又担心，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

近日来常有报刊的记者来采访我，要我谈七十年前“五四”的情况，也不免要谈到“科学”和“民主”，还问我七十年以后的“科学”和“民主”比七十年前的，有没有进步？我说七十年过去了，当然应该有些进步，但是我觉得“科学”上的进步比“民主”快得多。

“民主”拿通俗话来说，就是人民大众都有议论

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利，但是人民必须对于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听得见，看得见，才能有正确发表意见的可能。社会有什么大事发生，让人民能及时从报刊上，广播里，电视上看到事实真相，听到不同声音，人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对整个国家来说，透明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大，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地把国家搞得繁荣昌盛起来！

1989年4月28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89年8月创刊号。）

痛悼胡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我眼泪落在衣襟上。同时涌上我心头的却是《诗经·秦风》里的两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真是，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

该死的就是我自己！虚度了八十九个春秋，既不能劳力，也没有劳心。近来呢，自己的躯壳成了自己精神的负担，自己的存在，也成了周围的爱护我的人们的负担！

算起来耀邦同志比我小十六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龄。我不记得我和他有什么熟悉的接触，我只记得我也荣幸地得到他赠送的一筐荔枝。

但是从我的朋友——年老的和年轻的——口中，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他狠抓落实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的政策，这使得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从心里感受到他的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他是敢于坚持的！

他深入群众，做人民的知心朋友，他和敬爱的周总理一样，会永远地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上，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死亡就不是生命的界限了。

1989 年 5 月 2 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群言》1989 年第 6 期。）

致 萧 乾^①

乾弟：

好久不见了，怪想的，有空来谈谈吧。附上一信，我们都不“实际”地编校刊，你看这信如何答复^②？均请你代劳了。我近来还可以，只是情绪起落太无恒了，人老了，人就糊涂了。

祝你一家好！

① 萧乾，作家、翻译家、著名记者。蒙古族。1909年12月17日生于北京。1933年开始发表小说。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副刊《文艺》的主编。1939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1944年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6年回国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文艺报》副总编。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作品有《梦之谷》、《篱下集》、《栗子》、《人生采访》等。译著有《大伟大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故事集》、《好克帅克》、《战争风云》等。因与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同学，故以姐弟相称。

② 冰心与萧乾名义上为《燕大校刊》主编，并不负实际责任。冰心收到一封信，转请萧乾处理。

冰 心

五、五、一九八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萧乾 文洁若^①

亲爱的乾弟
洁若：

巴金在华东医院病中还给我写信。不短，真难为他。乾弟的信和剪报都收到了，谢谢。

今年是你的“得意年”，出了那么多的书，又当上了什么馆长，继叶老之后，名誉不低呀！看你的得意劲儿！

当大姐的当然也跟着你得意，我面上也有光彩呀。

你出的书，当然要送我。洁若写的文章^②，发表在哪里，我也想看看。请你告诉她：“萧乾能得到你，太幸福了，他不配！”

一家老小都问你俩好。

① 文洁若，萧乾夫人。

② 文洁若：《冰心，一颗炽热的心》。

冰 心

五、十一、一九八九

（此信最初发表在《上海文史》1992 年第 4 期。）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四十周年题词

快乐神圣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在眼前了。

愿中国年轻力强的母亲们，带领起她们朝气蓬勃的儿女们，扫除了前进路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充满着希望地向着九十年代民主和法制的锐光四射的康庄大道上同时代齐步迈进！

工人日报“女工园地”副刊万岁！

冰 心

一九八九、五、二十六

（题词最初发表于《工人日报》1989年6月1日。）

又走了一位不该走的人

在我的日记上有：“3月26日，晴，吴平夫妇来午饭（吴平是我儿子，他的爱人陈凌霞是阜外心脏病专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冰心注），带来了一本精装的《刘厚明作品选》，扉页上写着：‘请我所深深敬爱的冰心老师教正，1989年3月23日，刘厚明’。陈凌霞还说：‘刘厚明的心脏病快痊愈了，他说一两天内就来看您。’”

于是我就天天等着晤见这个可爱的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

但是，从4月27日的报纸上，赫然地看到刘厚明于22日逝世的消息！我惊呆了，眼泪涌了出来，我永远看不到他了。

4月29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当然去不了，陈凌霞替我送了一只花圈，事后才告诉我。

我和厚明相识，大概是在1953年左右，那时张天翼同志和我还有金近同志等一些有意写儿童文学

的同志们，常在北京东总布胡同 22 号中国作协会址，邀约一些年轻的作家，座谈儿童文学创作问题，厚明便是年轻的作者之一。厚明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不是儿童文学“作者”，他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他的言谈举止中充溢着童心。他在儿童中间，真是“如鱼得水”般地活泼、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谈恋爱般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或其他造作的意味。这样的人格，写不好儿童文学才是怪事呢！

果然，刘厚明的每一篇作品都证实了我的看法，使我快乐，使我读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也许在这里我不该说，现在有的儿童文学作品，看了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太矫揉造作了，孩子们就像你们笔下那样地“不像孩子”吗？

厚明，你不该走，更不该不见我一面就悄没声地走了，你对不起我！

1989 年 5 月 6 日晨 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7 期。）

一 饭 难 忘

《群言》杂志社给我来了一封征稿信，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纪念日，约请知识界人士讲自己 40 年中一件难忘的往事。

1951 年，我们艰辛辗转地回到了热爱的祖国，从头回忆这 40 年的岁月，真是风风雨雨。我们也和全国知识界人士一样，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回忆的神经也都麻木模糊了。只有一件极小而值得铭心刻骨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永远清楚活跃地展现在我眼前，这便是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共进的一次晚餐。

那是 1952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总理办公厅来了一个电话说总理在这天晚上约见我们。

我们是多么兴奋呵，只觉得这一天的光阴是特别地长，炎热的太阳总是迟迟地不肯落下去！好容易在我们吃过晚饭后，大约是傍晚 7 时光景，来了一辆小轿车和那时还是个小伙子的罗青长同志，把我们

接进夜景如画的中南海，到了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笑容满面地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又亲切地让我们在他两旁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辗转回来的经历。我们也一一作了回答。这其中不时都有工作人员来送文件或在总理身边低声报告些什么。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想总理日理万机，不应该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起身要走，总理却挽留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和我共进晚餐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可以谈谈。”

我也忘了桌上还有其他的人没有，只记得饭桌上是四菜一汤，唯一的荤菜竟只是一盘炒鸡蛋。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一位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我们热爱的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客人”。

饭后，我们知道总理很忙，时间又那么晚了，即便道谢告辞了出来，总理还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慨叹地说：“时光过得真快，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

说来惭愧，我这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客，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在国内、在海外，什么蜗牛、肺鱼、蛇肉、马肉……我都尝过，但是主人的姓名和进餐的地点，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周总理约我的那一顿

朴素的晚餐，却永远遗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群言》1989 年第 10 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前几天听卓如同志说，您的患癌症的爱人已于令郎完姻后一日逝世，十分不安！癌本是不治之症，久延只是痛苦。她又看了儿子完姻之后才走，心里一定安慰，我请您节哀！保重！死者已矣，生的还有工夫要做，我有此同感。

匆祝

近安！

冰 心

六、廿、一九八九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信收到，您在“心灰意懒”之中，还在编我的文集和《冰心传》，真是太感谢了！这种书现在不会有什么销路，可惜我不会写武侠之类的东西。

您现在还是随意做些什么，想看，想写，就随意去做，也是消磨日子之一法，至于日常生活“琐碎庸俗”，是不能免的。记得昔人有诗云：“琴棋书画诗酒花，当时样样不离它，而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他这牢骚，也不实际，人生有精神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只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生活的，是“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们！我自己就是每日要给保姆算日用帐，何尝不是柴米油盐？

您的“悼亡”心情，我完全理解！生和死只隔一层纸，还不是一堵墙。幸而夫人也还是善终，不像当年萧珊之死，对于巴金是那样地冤抑，这样一比，就

会自宽了。凡事若看得太真，特别是现在世界，就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我也不是没有悲愤的事，但常用陶靖节先生的话以自解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勿上，祝
好！

冰 心

七、四、一九八九

致 颜 学 琴^①

学琴同志：

金近同志逝世消息，吓了我一跳！说实话，这些年来，我对于生死观淡得很，有两句话是我的座右铭：“浮生若梦，视死如归。”金近同志患病已久，去了是个解脱。希望您千万节哀！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都会重新欢聚的。

冰 心

七、十二、一九八九

① 颜学琴，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的夫人。

致 陈 荒 煤^①

荒煤同志：

大作两本已读毕，真是各人的少年遭遇不同，但坎坷更能出人材，您就是一个！

忙中勿上。祝
安好！

冰 心

七、十四、一九八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① 陈荒煤，作家，1913年生，湖北襄阳人。1932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电影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突变》；报告文学《新的一代》；散文《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

钱钟书与杨绛

钦业同志：

您的六月二日挂号信（今年？）我没有收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的信却收到了。您要我写《文人笔下的钱钟书》，我感到荣幸，但要写钱钟书就不能不写他的夫人杨绛，因为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我仿佛记得我先认识的是杨绛，先读到她的《干校六记》，深喜她的雅人逸致，后来才认识钱钟书，虽然他的大名我是“久仰”了。

我记得他们是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文人荟萃的丛楼中之一，我送书给他们，是送到那个住址。我自一九八〇年伤腿后，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八九年了，也忘记我曾造府拜访过没有？但在那几年中，他们曾来看过我，我们谈得很痛快，钱钟书更是谈笑风生！从我的外孙陈钢替我们照的相片里，还可以看出钟书手指目送的豪爽情态。

他们送了我许多书，我从书橱中检出的有钱钟书的《围城》、《旧文四篇》和《谈艺录》。有杨绛的《倒影集》、《干校六记》、《喜剧二种》、《钱钟书和围城》、《回忆两种》、《将饮茶》等共六卷。在这些书的扉页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师”，自称为“后学”，其实谁都知道，我除了大过他们几岁之外，论学问、论才华，我都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

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我近来身体不好，夏来天气又阴郁闷热，开着“空调”，我还觉得难受。好在您说过“文章长短不拘”，我就“要言不烦”了。在此，我祝愿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双学者才人的夫妻，身健笔健，白头偕老！

冰 心

1989 年 7 月 21 雨晨

致 王 安 忆

亲爱的安忆：

难得你还记得我这个老人！谢谢你寄给我的《海上繁华梦》，我昨天看了一天，差不多看了大半，你的手笔越来越细腻了，希望你再往“大事”上好好写下去！

你妈妈一定忙，她好吧！请代问安，你自己做了母亲没有？问全家好！

冰 心

七、廿四、一九八九

（发表于《海上文坛》1992年1月号。）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我是通过我的老伴吴文藻和刘氏兄弟认识的，他们三人都是江阴人，又都在当时（1926—1938）燕京大学教课。

我不记得我曾去刘氏兄弟的北京城内的家里没有，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来我们燕大的教授宿舍，和文藻谈些有关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门学问，我是一窍不通，也插不上嘴，只记得有一次在递茶的时候，我对他们笑着说：“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人’怎么样？”我们大笑起来，后来我到底也没有收到这一颗印章。

刘天华先生当时在燕大音乐系教授中国音乐，一九三〇年我母亲在上海逝世，我侍疾送葬后回到北京病了一场。病后心情很坏，我便请刘天华先生教我吹笙，他说：“你有吐血的毛病，吹笙伤气，不如

学弹琵琶吧。”后来又因为我的手臂和指头都很短，他又特别定制了一张很小的琵琶送我。我一共才学了几次，便因为阑尾炎突发，进了协和医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那位美国外科主任说我是个神经质的人，给我做了全身麻醉，我在进入迷糊的时候，似乎见一双大手在我的手术台边，给我弹着一首十分清脆的琵琶曲子。后来似乎是刘天华先生病了，我也没有再学下去，只将那张琵琶用锦囊珍藏了起来……来纪念在燕大执教过的刘天华先生。

与刘氏兄弟离别已五十余载，但是刘氏兄弟的声音笑貌（半农先生是豪放，天华先生是冲和）总在我的眼前呈现，我永远也忘不了文藻的两位可亲可敬的江阴同乡。

（本篇最初发表于《太湖》1990年第9、10期合刊。）

开卷有益

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书信、刊物和文件，我是除了文艺杂志之外别的就不大注意了。前些日子收到了政协的《学习参考资料》第4期，有一篇是南开大学教授陈荣悌写的《从脑体倒挂看四化和教育危机》看了以后，使我死水般的情绪又起了波澜！

教育问题我从前也谈过一些，都没起什么作用。“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古人早就给了我一服自慰良方，我何必老来自讨苦吃？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一个堂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最终要被开除了球籍，未免有点不甘心。

假如读者中还有一些人——恐怕也只是所谓之“知识分子”的——对这篇文章感到兴趣，请去找那篇全文来读。我只能抄下一部分使我最动感情的片段。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科技是关键，教育是

基础’是十分英明的决策……但实践上却遇见不少困难，近年来又出现了‘脑体倒挂’这一新名词，中国历史上没有听说过，国外也未提到过，而是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事情。（着重点是笔者加的，下同）。

“（一）历史变迁

……士即知识分子，士的职业不外……教师数种。在清代大致为人平均收入二百两银子，是体力劳动者的 13 倍，从辛亥革命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八年间，除后十年陷于战乱……当时城市中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低于 15 元，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为 80—100 元，即为工人的五至六倍，若把教授等‘高薪阶层’的薪金加入计算……教授的月薪约 300 元是工人的 20 倍。

“一九四九年以后，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五二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大致相等，教授的最高收入约为机械工人的 2.4 倍，但这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一九五六年工资调整……但中青年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也相差不大（大学毕业生工资 56 元）。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正常的晋升得不到保证，脑体收入差距逐渐消失。北京统计局的调查认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脑体工资基本持平。一九七七年以后改变了长期不长工资的停滞局面，但因体力劳动者的增加幅度较大，特别是

附加工资和奖金多，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地区一九八二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比体力劳动者低 8 元。

“从以上数字可知，百余年来，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脑体力收入差距的变迁：清朝时期脑体收入相差 13 倍，民国时期虽然新型知识分子取代了士大夫，但脑体收入差距仍成数倍至十数倍。解放初期除少数高知外，脑体收入持平，七十年代脑体收入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倒挂现象，现在的倒挂幅度更大了，据说有些一二级老教授已在申请生活困难补助了。”

在“（二）国际水平的比较”的标题下有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各国教师收入的比较表，从中看出：“而同档次的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工资收入指数都比我国的高。”

在“（三）各国教育经费比较”中，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八七年教育年鉴的一些数字”，上面列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是 8 美元，居末位，中国的上面是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它的土地面积是九十二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是七千五百万人！

在“（四）教育投资是生产力的投资”这题目就

说明了一切，我也不必多抄了！

在“（五）脑体倒挂的恶果”栏内说：“现在的教育危机是众所周知的事，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一九八八年小学生失学的人数 428 万，中学生 287 万，全国还有文盲 2.3 亿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可归之于人的素质低下。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投机倒把，青少年犯罪增加，一切向钱看等等，都是人的素质低的表现，学校培养不出建设的人才，不合格的教师人数占很大比例（小学 $1/3$ ，初中 $2/3$ ，高中 $1/2$ ）如要改变这种情况，增加智力投资是唯一出路。现在学历越高的研究生毕业后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在“（六）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应有远见”的标题下，他引用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的话说，“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这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苏联经济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候说的！

这篇文章里还引了许多美国和日本怎样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教师待遇的例子；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引多了怕会倒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我也不费那劲

去抄了。但是这篇文章中有：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从根本上说，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还有“陈云同志前些年就提出的‘教师应是使人们羡慕的职业。’”这些领导同志们的金口玉言，总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吧！但是“先经济，后教育”，“生产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这种落后的社会观念，仍旧牢牢地拖住实践的后腿，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看那三项提议，都是“老生常谈”。老生们（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早已谈过了许多），但现在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就是教育经费补加了几十亿投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一亿的人口的大中国里，也只是杯水车薪……

这本《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发言专集》的“学习参考资料”，今年四月底就到我手里了，我读了陈荣悌教授的发言，真是感慨万端，我的这篇《开卷有益》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个月，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

1989 年 8 月 11 日浓阴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10 期。）

忆 读 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中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

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筐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水浒传》尤其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强强强地写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

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一九八六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

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己！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989年9月8日清晨

国际扫盲日、中国教师节前夕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年第11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上海作协徐铃同志和电视台祁鸣同志来，收到你给我的月饼两盒，十分感谢！我给了吴青一家一盒，其余我自己吃了，还招待了朋友（前天韩素音来，就请她吃了）。上海月饼就是好，北京月饼太硬，真是“斧砍不动”！

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上次棠棠来了，我看见他，真是高兴，他潇洒爽朗，文如其人。小林一家好吗？听说暄暄随她母亲出国了，是吗？

愿你千万保重！！

冰 心

九、九、一九八九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今年十月五日前后，把我忙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我这一辈子就没过过这么富足的日子！

十月五日，是我八十九岁的生日，真没想到我这个人能活到这么悠长的岁月！

我母亲告诉过我，“你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以后在一九二三年办出国留学以前，由协和医院检查断定我的吐血，是肺支气管扩张，而不是肺癆。每次吐过血，只要躺下休息一两天，就可以了，也不必吃药。因此大家都放了心，虽然有时我会吐到满满的一大杯，我也不在乎。

记得一九二四年在美国的绮色佳，文藻向我求婚时，我吓唬他：“我是说死就死的人，你何必找一个不能‘白头偕老’的伙伴？”他说：“无论如何，我认命了。”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到英国访问时，在伦敦又吐了一次。我瞒过了团员，仍旧出席当天特别为我举行的酒会。那天我当然不能躺下，而且还得举

着酒杯，整整地站了一个下午。谁知从那时起，我居然不再吐血了。

话说回来吧，我今年生日得到的礼物：除了大大小小的蛋糕；大大小小的盆花，青松；大大小小的花篮；还有花瓶，瓷的，陶的，竹根漆的……以及朋友们自己画的：寿桃，水仙，牡丹……以及他们自己写的祝寿的诗，文；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从海内外寄来五彩缤纷的卡片和电报！这一切都使我感激，惭愧！我还只能把送礼的团体的名称，和个人的名字，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不敢宣布，免得有人讥笑我“叨光”。

我以多灾多病之身，居然能够活到今天，当然因为是晚年欣逢盛世，过的是太太平平日子，一半也因为周围的人们对我的关怀照顾。首先要提到的是，我的二女婿的大姐——陈珣同志。十年来她和我朝夕相处，使我这个废人，能够像好人一样地生活下来……将来我要详细地写关于她的一切，在此就不细说了。此外是北京医院的大夫们，每月一次地给我检查身体，给我开药；还有就是我的老少朋友们不时地给我送些人参、阿胶、蜂皇精……吃不过来的补品。最后是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孩子们，待我还算不错。我和他们在一起，喜笑的时候多；生气的时候倒也有，那是在他们对我的起居饮食“管制”得太

“严”的几次！

近十年来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在“惊呼热中肠”之余，总会想起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一句至理名言，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

两年前我就求胡絮青大姐替我找了一位老先生为我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聊供自警！这篇想到就写，也就作我对亲友们的谢信吧：我不能分别答复了！

1989年10月11日匆草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年第12期。）

我家的茶事

袁鹰同志来信要我为《清风集》写一篇文章，并替我出了题目，是《我家的茶事》。我真不知从哪里说起！

从前有一位诗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写过一首很幽默的诗：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时样样不离它
而今万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首诗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首诗第一句的七件事，从来就与我无“缘”。我在《关于男人》写到“我的小舅舅”那一段里，就提到他怎样苦心地想把我“培养”成个“才女”。他给我买了风琴、棋子、文房四宝、彩色颜料等等，都是

精制的。结果因为我是个坐不住的“野孩子”，一件也没学好。他也灰了心，不干了！我不会做诗，那些《繁星》、《春水》等等，不过是分行写的“零碎的思想”。酒呢，我从来不会喝，喝半杯头就晕了，而且医生也不许我喝。至于“花”呢，我从小就爱——我想天下也不会有一个不爱花的人——可惜我只会欣赏，却没有继承到我的祖父和父亲的种花艺术和耐心。我没有种过花，虽然我接受过不少朋友的赠花。我送朋友的花篮，都是从花卉公司买来的！

至于“柴米油盐酱醋”，做为一个主妇，我每天必须和它们打交道，至少和买菜的阿姨，算这些东西的帐。

现在谈到了正题，就是“茶”，我是从中年以后，才有喝茶的习惯。现在我是每天早上沏一杯茉莉香片，外加几朵杭菊（杭菊是降火的，我这人从小就“火”大。祖父曾说过，我吃了五颗荔枝，眼珠就红了，因此他只让我吃龙眼）。

茉莉香片是福建的特产。我从小就看见我父亲喝茶的盖碗里，足足有半杯茶叶，浓得发苦。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

23岁以后，我到美国留学，更习惯于只喝冰冷的

水了。29 岁和文藻结婚后，我们家客厅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虽然摆着周作人先生送的一副日本精制的茶具：一只竹柄的茶壶和四只带盖子的茶杯，白底青花，十分素雅可爱。但是茶壶里装的仍是凉开水，因为文藻和我都没有喝茶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文藻的清华同学闻一多和梁实秋先生来后，我们受了一顿讥笑和教训，我们才准备了待客的茶和烟。

抗战时期，我们从沦陷的北平，先到了云南，两年后又到重庆。文藻住在重庆城里，我和孩子们为避轰炸，住到了郊外的歌乐山。百无聊赖之中，我一面用“男士”的笔名，写着《关于女人》的游戏文字，来挣稿费，一面沏着福建乡亲送我的茉莉香片来解渴，这时总想起我故去的祖父和父亲，而感到“茶”的特别香冽。我虽然不敢沏得太浓，却是从那时起一直喝到现在！

1989 年 10 月 16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0 年第 3 期。）

给《农村孩子报》的回信

来信和报纸都收到，农村居然有了孩子报，使我惊喜！“无农不稳”，孩子报应当使“农”从“知识”中得到“稳”的基础。我拟为副刊命名为《黄土地》，因为土地最扎实。当否？

祝好！

冰 心

1989、10、22

（此信发表于《农村孩子报》1990年1月6日第148期。）

叶圣老—— 一位永垂不朽的教育家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何钦贤和虞音两位民进的干部来了，说本月二十八日民进要召开一个纪念叶圣陶老先生的九十五诞辰大会。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了下来。

我从八〇年断腿，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将九年了，这个盛会我当然不能参加，但是我还愿意向民进同仁们说几句我对于叶老崇敬眷恋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想到叶老只大我五岁，我总把他当做比我大过十岁的前辈。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从杂志和报纸上读过叶老写的使我心折的儿童小说，而且知道他很早就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他诱掖后进，不遗余力。我的朋友巴金、丁玲还有许多教育界、出版界、社会活动家中的著名人士，都是他一手培育出来的。

叶老对于教育界的丰功伟绩，许多人士都会比

我写得更详尽，更彻底而内行，我只能将刻在我心版上的一件有相片为证的往事，来说一说。

叶老庭院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花树，花开时节，清香四溢。叶老知道我爱花，每到花时，必定约我来观赏。但是每年这时候，不是他不适，就是我有病。幸而在八七年，也就是叶老逝世的前一年，我们还都健康，于是就由一位民进的干部同志驱车来接，这是我八九年中唯一的一次出门拜访！那天我扶着助步器，艰难地迈进大门，站在叶老家的海棠树下，在开满枝头的繁花香里，同叶老一起观赏了半天。那天我的小女儿吴青也带着她的儿子陈刚跟我去。陈刚为叶老和我在树下和屋里照了好几张相片。这些相片我当永远珍藏！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我从心底认为叶圣老对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这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不朽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喜读《民主》第一、二两期

启邠同志：

看了两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我居然发出了“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

对于许多的大块文章，除了拜服之余，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讲几篇使我特别感动的较短、较轻松的作品。

如第一期中柯灵的《幸存者的足迹》。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过我一本《懒寻旧梦录》，我也细看了，知道了许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感触也很深，但那些旧梦都已过去多年，不寻也罢。我倒是同意柯灵同志所说的：“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我想“新梦”定比“旧梦”难写多了！

江北同志的《黑色的星期六》读了使我泪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说的那样，他“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我自己特别感受到的是他为千百万个

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改正了冤假错案，使这些本来就不被人重视而又打入地狱的臭老九，重见了天日！

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从天安门到八宝山，15，5 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宽阔的十里长街，再一次记录下一个悲哀的史实。”

这里说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长街”，是 1976 年千千万万的人民，号哭着追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动人场面。这时我想：第三次这样的“十里长街”，会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呢？

贺宛男同志的那篇《一个非党副县长的心理话》，我想请同志们细细地去重读一遍！为什么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她要为民主政治争气，却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痛苦境地？为什么中青年非党从政者中不少发出了“要从政，一定要入党的声音”。现在的中国的执政者，当然是共产党，但是非党人士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只能“该握手时握手，该举手时举手，该拍手时拍手”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的问题。

金性尧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为》是读了故宫博

物院印过的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笔》里谈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事实。使我想到那个“主”，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好处，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来梟“主”心中不易的真理，从近代的世界史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里有徐章英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细读。这里我只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调”，就是每次领导上做“政治报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是在分配“经费”时，却总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中国的公民们也要弄个明白。

最后我要提到赵丽宏同志的“岛人笔记”——赵丽宏同志也是民进会员，这使我十分高兴——我在《散文选刊》上已看到了《花痴》和《秘方》两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然能看到那篇举发性的《友尊》！一个博物馆警卫居然变成了博物馆革委会主任。他和四人帮时期的康生一样，“都是抄家物资，凡是有点古气的，都集中在我这里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过问”，骄横之气，使人发指！这使我想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我的被红卫兵们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妇送我的字、画、扇子等等

.....

启邠同志，回到《民主》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罢，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正如你说的“……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

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民主》的年轻编辑们，当以此为座右铭！

1989年10月30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89年第4、5期。）

儿童是最真诚的

《小学语文报》的编辑同志来给我看了几篇有奖征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征文要求，第一是“所记事实必须真实”。据我和小朋友们数十年来接触的经验，儿童是最真实的，只要你和他平起平坐，以诚相见，他们决不会对你说半句假话！

现在让我从我看过的第一篇文章说起：

这是北京市昌平区秦城小学五年级同学宋治华写的。

她讲了她的爸爸当医生，妈妈当会计的一个三口之家，讲到她的家庭生活，“一切都是那样自然，有规律”，最后高兴地说：“我的家庭是多么幸福啊！我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和骄傲。”

第二篇是山东昌邑县都昌镇中心小学五（1）班张京伟同学写的。

她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跟着姐姐住在

姥姥家。姥姥去世以后，她和姐姐相依为命，度过了童年辛酸的生活。她在文章结尾时说“朋友们，好好珍惜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吧！我所在的这个不幸家庭，使我尝到了生活中酸甜苦辣，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对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更加懂得了珍惜生活长河中的每一滴幸福。”

第三篇文章是四川省万县市城四校五年级（1）班同学晨雾写的。

他有一个工作认真，待人和善的爸爸，可是在机关里总是“受气”。回家来向妈妈诉说，妈妈的火就上来了。有时爸爸也发火，便和妈妈争吵……于是这个孩子发表了他的公正的看法：“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爸爸工作认真负责是好的，可恨的是单位上一些得过且过，无真才实学的‘寄生虫’”。

“我是多么希望真正的人才有用武之地，爸爸妈妈不再为这事儿争吵了啊。”

这位小同学是在严肃地“议政”了！

第四篇文章是四川南光地区棉纺厂子弟学校五年级刘征同学写的。他说“每个家庭，都是大集体中的小集体，它们每天都演奏着喜怒哀乐变奏曲，我们的一家也不例外。”接着他说，“我爸爸是我家的‘笑星’，他说话非常幽默风趣……他很爱音乐。”他妈妈

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虽有时也和他爸爸“吵吵闹闹”，但都被他爸爸的幽默逗笑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的家庭充满了幽默、欢乐。我爱这充满欢乐和幸福的三口之家。”

第五篇文章是黑龙江尚志市珍珠山乡小学四年级（1）班王贯利同学写的。

他说“提起我的家庭令人心寒……爸爸妈妈三天两头打架，邻居大叔、大婶说他们战斗了一辈子。”他五岁时，他爸爸就“举起菜刀要砍人……我一直跪到他放下菜刀为止……从那以后，‘战争’不断发生，有时打仗后爸爸好几天都不让我们吃饭”。他最后悲愤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孩子有幸福的家庭，美好的学习环境，十分羡慕。我多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在肥沃的土壤中快快成长，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

这个同学是有理想的！他在开篇里就说，“家庭好比土壤，滋润着幼苗茁壮成长”。他希望他的家庭是一块好土壤，倒不只是使他脱离苦难，而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好环境中长大，将来能成为祖国有用之材。这是一个多么有志气的苦难的家庭中的孩子呵！

往下我又看了几篇征文，但是越看越累，心中也不大愉快。这些篇名和作者就不提了。有的家庭，因为爸爸有一个“漂亮”的脸，就招来了一个姑娘，成了家庭中的第三者，但他妈妈是个善良容忍的人，离

婚后仍劝他不要怨恨爸爸，因而他只能对爸爸说“愿您的内心如同外表一样美好”！

还有个家庭是：爸爸很爱他，妈妈却天天和爸爸吵架。他八岁那年，妈妈忽然对他说“你的爸爸走了，不要你和我了。”当天晚上，他被警车声惊醒了，妈妈被扭上了警车！原来妈妈把爸爸杀害了。这件事更是出我意外！

我没有精神往下看了。编者的话说：征文启事登出，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稿件一千五百多份。我还是说：孩子是最真诚的，他（她）们总对真诚对他们的人，倾吐出心里的快乐和悲哀。他们不会“顾面子”，也不懂得“家丑不可外扬”。我认为想做社会调查的学者们，应当向《小学语文报》的编者学习，向小孩子们征文，倒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的实况！！

1989年11月9日阴雨之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语文报》1990年1月4日。）

关于男人（之九）

十一 怀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

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

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

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十月九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989 年 11 月 1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90 年第 2 期。）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今年我的生日时，我的小老弟萧乾送来了一尊寿星，还附了一张条子，大意说：这世界上真不公平，我走遍了市场竟买不到一尊女寿星，只好送你一尊寿翁。小朋友李小雨送我贺寿的礼物，也是一尊小寿翁。

这便是数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一个铁证！虽然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上妇女的寿命一般也长过于男子。

我想这可能是塑像或捏像的工匠都是男人，他们不会想起去塑或捏一尊女像。

我把人家送我的大小寿星，都转送给了过生日的男性朋友。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祝福，但却不大愿意把寿翁摆在我的玻璃书柜里。一来因为我从来不信神佛，二来我相信“天助自助者”，没有神佛的保佑，我也挣扎着活到了 90 岁！

1989 年 11 月 16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0 年第 2 期。）

再谈我家的对联

我的福州老家和我的北京老家，就说是谢家吧，在书房、客厅、堂屋的墙壁上，都挂有许多对联。在福州老家我祖父的书桌旁，就挂着他的座右铭：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祖父对我解释说：“有的东西，比如衣、食、住吧，虽然简陋素朴一些，也应当‘知足’；而对于追求知识学问和修身养性上，就常常应当‘知不足’。对于应当做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就应当勇往直前地去做；而那些违背道义的事，就应当坚决不做。”我觉得我很喜爱这两句有骨气的话，以后有人请我题字的时候，我就常常写下这副对子。

福州老家东屋厅堂上还有一对楹联：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在西屋客厅往南去的三间小楼的楼下的中间墙上，有一副对联是：

雷霆走精锐
冰雪净聪明

这两副对联，有了使人觉着心里有一股寥阔清明之气！

在北京老家，父亲的书房里，挂着萨镇冰老伯送给他的一副对联是：

穷达尽为身外事
升沉不改故人情

这就说尽了朋友间相知之深，情谊之厚！

北京老家的堂屋还挂有乡老先生林则徐的一副对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我非常地喜欢这两句话！念了总觉得有股凛然之气，扑面而来。它不但描写了我所热爱的大海和高山，那“有容”和“无欲”四个字，更含有很深的意义，这使我联想到古人咏“汤圆”的不计毁誉句子：

甘白俱能受
升沉总不惊

无欲又使我忆起诸葛武侯训子篇中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名言。

这些挂在墙上的好对联，孩子们天天眼里看着，口里念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于他（她）们人格的培养，是有很大的好处，其效果决不在“言教”和“身教”之下！

1989 年 11 月 17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0 年第 2 期。）

谈孟子和民主

听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写了一本叫作《孔子》的书，在日本大受欢迎，成了畅销书之一。对于至圣先师孔子，我当也极尊崇。我小时候在私塾里，也读过背过一部《论语》，以后又读、背过《孟子》，可惜只读了一章，我便进了学校，改读“国文教科书”了。

前年我托朋友买了一本《十三经》，想自己阅读古人的书，以补我的对于祖国古典经史知识之不足。这十三经是：1. 周易，2. 尚书，3. 毛诗，4. 周礼，5. 仪礼，6. 礼记，7. 春秋左传，8. 春秋公羊传，9. 春秋穀梁传，10. 论语，11. 孝经，12. 尔雅，13. 孟子。

我不厌其烦地写出了《十三经》每一卷的名字，因为我读了前几卷，有的不懂，如《周易》，有的太繁琐了，如《礼记》之类，只有《毛诗》还看得进去。一直看到第十三卷《孟子》，我心里忽然感到豁然开

朗，没想到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人，就主张“民主”，且言论精辟深刻！我希望读者们都自己去找出这本古书来，细细地读它一遍！在这里我只能举出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的几点：

他主张“与民同乐”，他处处重视“人民”，把“人民”放在“君主”之上。

他说，国人皆曰可用，则用之；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这里的“国人”，就是“老百姓”，就是“人民”。凡事不能由“君王”擅自作主。

他主张君臣平等，他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当君王把人民踩在脚下的时候，人民就可以把君王当做敌人。这话说得多么直接痛快！

他的“大丈夫”的定义，也是极其深刻的。“大丈夫”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堂堂男子汉”，是个极其自豪的名词。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把“富贵不能淫”放在首位，足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凡是有操守的人都还容易做到，富贵了而能不被淫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富贵了必然有权，有权就有了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了权就可以胡作非为，什么民意，都可以不顾了！这些都是富贵能淫的人。富贵了而能不被淫的人，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看，几乎数不出几个来！

1989 年 11 月 29 日

（本文刊于《中国文化》1990 年 12 月第 3 期。）

毛泽东诗词鉴赏一得

我一向认为毛主席写诗词，不像我们祖国古往今来的诗人、词人那样，是“做”的，“填”的。毛主席的诗词是他在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时随地的思想感情，采用古典诗词的文字形式的自然倾吐，它们像爆发的火山一样，红光冲天；像奔流的巨瀑一样，浪花飞溅！他对于古典诗词有很深的爱好和修养，出口成调，大气磅礴，豪迈精深。

我从前曾写过一篇“一个最有力量的汉字”，就是“万”字，说这个字表达了浩大的气势和雄伟的气魄，如成语中的“万众一心”，“万人空巷”等等；诗中的“万山无语看焦山”，“万朵红莲礼白莲”等等。

毛主席诗词中的“万”字，就屡见不鲜，如《沁园春·长沙》（1925年）：

.....

看万山红遍

·

层林尽染

.....

万类霜天竞自由

.....

粪土当年万户侯

.....

这一首词内就用了三个“万”字！在《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中，有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在《采桑子·重阳》（1929年10月）中，有

.....

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中，有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年春）中，有

万木霜天红烂漫

.....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又如：《十六字令三首》（1934 年到 1935 年）中的其二，有

.....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在《七律·长征》（1935 年 10 月）中，有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中，有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又如《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中，有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在《沁园春·雪》（1936年2月）中，有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中，有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又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 年 10 月)中,有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在《水调歌头·游泳》(1956 年 6 月)中,有

……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在《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 年 5 月 11 日)中,有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 年 7 月 1 日)第一首中,有: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在《七律·答友人》（1961 年）中，有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 年 11 月 17 日）中，有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七律·冬云》（1962 年 12 月 26 日）中，有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 年 1 月 9 日）中，有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在《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 年秋）中，有

鲲鹏展翅
九万里
·
翻动扶摇羊角

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 年）中，有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

在《念奴娇·井冈山》（1965 年 5 月）中，有

参天万木
·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一声鸡唱
·
万怪烟消云落

这些“万”字，有的是实指，有的是虚数。不论虚实，都表示了毛主席的胸怀与气魄；在艺术上，给

人以强调和强力之感。

以上是我拜读毛主席诗词之一得，肤浅得很，愿得同志们的指教！

1989 年 12 月 13 日

（本文刊于《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

介绍《铁血情缘》

从十年前断腿之后，出不了门了。游山逛水，探亲访友，都是梦里的事了！听收音机和看电视（除了书报之外）是我知识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看电视，我最喜欢看“人民子弟兵”的节目，听收音机我最爱听的也是军事生活。有关于陆、海、空军人，武器，以及和这些事有关的一切一切我都爱看爱听。

前些日子阅读《福建文学》1989 年第十一期，使我意外地兴奋！因为现在一般书报的文艺栏目内，多半讲的是风花雪月，山山水水，男欢女喜……对于我这个九十岁的老人，已不会再感兴趣了。

《福建文学》89 年第十一期内第一篇文章《铁血情缘》，是张德崇同志写的（这位作家我不认识），讲的是大学生军训的种种事情，使我受了极大的激动！我忆起我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就和军事接触，每早都听到起床，每晚都听到熄灯的嘹亮的号角，以及从我家楼上能看到的每天早上海军学校学生的出操，昂

首挺胸，真是整齐威武，和我十二岁到北京以后看到的男女学生列队体操的随便形象，就大不相同了。

我请读者们自己去看这篇文章，在这里我只能把这篇文章的提要意思、男女大学生受军训时期和以后情感的叙述，抄了下来：

A 几时有这样的感受，几时有这样的依恋，几时有这样的惜别……

B 兵营是强者的天堂，这里不需要“宝贝”，那被绿色浸透的严酷现实把十八九岁的童雅推向成熟与深沉，这是一次心灵的净化。

C 以雄体为主体的兵营，第一次开辟了女性群落。她们，具有少女的天真和温馨，又有着“娘子军”般的坚毅。你想知道军训“女兵”的秘密吗？

D 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军营已给了我们平凡人的崇高，已给了我们硬汉子的气魄，更给予我们思考，这不足够？

E 军营在重塑这批时代骄子的同时，自身所固有的生活模式也受到冲击，这是一组没有完结的故事，没有完结的思考。

这篇文章最后总结说：

目前，参训大学生已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军营也恢复了平静。但是，军营毕竟经受了一次全新文化观念的冲击。固有的生活模式出现了裂痕，一些不愿思考和不大引人思考的问题，通过大学生军训都暴露无遗，一切都在升华之中。我想，每一年的军训，军营都会有每一年的启示，每一年的收获。

抄了半天，手都酸了，中间又有几批客人来，把我的思路打断，但我的脑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现在是个十八九岁，能够参加军训的大学生，那该多过瘾！”

1989 年 12 月 26 日

（本文刊于《中国文化》1990 年 12 月第 3 期。）

我的写作经验

——为《中国初中生报》题

我自己写作的经验是：多读一些古典文学，如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样，在作文时，在用字造句上，就会自然、流畅，小朋友们不妨试试看。为中国初中生报题。

冰 心

一九八九、十二、廿八

（本题词最初发表在《中国初中生报》1990年1月3日。）